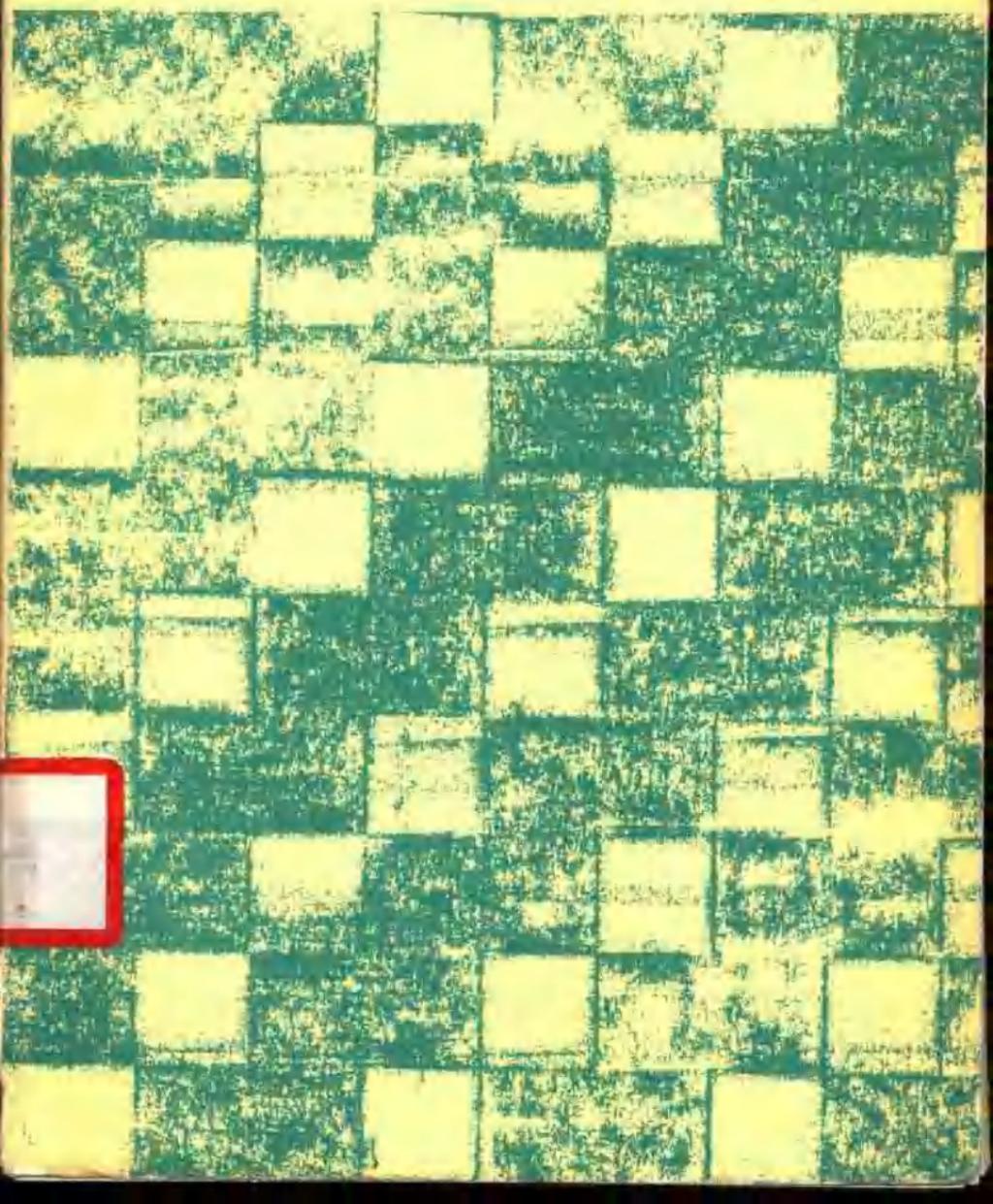


現代名著譯叢②8

發展理論

Ian Roxborough 著 · 馬紹章 譯



郭博文·高承恕主編

現代名著譯叢²⁸

發 展 理 論

Ian Roxborough 著

馬 紹 章 譯

發展理論 現代名著譯叢◎

77.9.0938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初版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著 者 Ian Roxborough
譯 者 馬 蘭 紹 章
發 行 人 王 必 成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61 號
電 話：6422629 • 394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 11008-28 •
六

序

本書基本上想探討的，是一些主要社會變遷研究中出現的理論以及方法論上的問題，尤其是那些發生在當代第三世界的社會變遷。不過，理論的批判（至少對有關第三世界社會變遷理論的批判），無法只在理論的層次上適當地進行，這是本書主要的前提。

很多討論第三世界的著作都犯了過度概括這個主要的毛病。似乎不少分析者都相信，我們可以建構一個低度發展社會及其問題的模型，就好像真有某種獨一的低度發展情境一般，而所有實際上的情境只不過是此一理想型 (ideal type) 的變異 (variations) 而已。對這種模型建構，有兩個反對的意見。第一，當代低度發展社會的變異範圍實在太大，大得可以中止用單一模型來描繪變成合理的事實。我們只要發展出數種模型，使每一實際的社會不會與這些理想型之一相去太遠，就可以輕易化解此一反對意見。的確，在目前低度發展社會變異範圍如此大的情況下，我們是有理由對「單一第三世界」說法的效用提出質疑。

第二個反對意見與第一個性質不同。認為我們可以採用某種低度發展社會的模型，而後藉以分析其社會過程的假

定，乃是一種不顧史實的假定。此一假定之所以是不顧史實的，乃是因其降低了下列二事的重要性。一方面，這種模型降低了變遷中之國際系絡的重要性，而此一系絡正是發展之所生的系絡。正如本書在論及帝國主義及依賴之章節中（第四及第五章）所欲闡發者，變遷中的國際系絡乃是第三世界變遷一個主要的決定因素。第三世界社會體系的變遷，基本上是外生的，而非內生的。因此，所有內生變遷的典範，本身就值得懷疑。

另一方面，大多數低度發展社會的模型也忽視了一點，即變遷中的經濟結構造成階級結構裏性質上的結構改變，以及引起階級聯盟模式的變化，這種階級聯盟模式的變化，對政治及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各低度發展社會之階級結構，其形式與歷史都有很大的差異，而且也構成任何解釋中一個主要的部分。

由於大多數討論發展社會學的著作都未能充分將上述反對意見列入考慮，結果才會造成在大而無當的層次上建立理論性的命題。有關發展社會學的文獻中，即充滿了諸如此類的命題：「軍隊是一股現代化的力量」、「資本主義的引進加速了農業的革命」、「第三世界的國家都是獨裁政體」、「帝國主義阻礙了經濟發展」等等。

一般說來，設若你採用了其中任何一個命題，則反對它的證據將和支持它的證據一樣多。把第三世界看成是由基本上相類似的單元所構成，這種途徑忽略了第三世界國家多樣的、相異的歷史過程。這些命題若要有任何用處，則必須使

其具有歷史的獨特性，不僅是就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來看，也要從低度發展國家與此一體系之聯繫，在其自身的歷史中，產生特有之階級結構及整套政治制度的過程來看。舉例來說，要解釋軍人干政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或者是農民革命與農業之商業化之間的關係，我們首先必須將此一社會置於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結構模型之中，然後再將焦點集中在此一國家特有之歷史如何影響各社會過程的相互關係上。（換言之，一個理論模型中，諸變數的因果關係，會因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而隨著社會之不同而有差異。）

這並不表示建立通則為不可能，也不意味我們只能探究一連串個別的歷史。建立理論性的通則雖然是可能的，但卻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以除非有更大的進展，適度尋求通則才是謹慎的做法。

因此，本書的工作即是檢驗一些今日流行的有關發展的理論，並且指出通則應當如何修正，才能產生合理適當的歷史解釋及系統解釋。本書的目的不在於窮盡所有重要的理論或理論羣，而是列舉一些例子來說明，藉以指出怎樣的解釋才是適當的解釋。此外，由對歷史獨特性的要求，可看出我已運用具體的歷史例證來支持我的論證。由於我主要是研究拉丁美洲，因此大部分的例證也取之於此一地區。大致說來，我相信此一分析適用於第三世界其他大多數的地區，至少從作為一個方法論的例證來看是這樣。不過，在實質方面還是需要相當的修正。這並不是一本討論第三世界社會之間題的教科書，因為在目前的知識階段，這是不可能的。本書

也不想以一種理論架構來取代另一種。本書基本上也不是要論證某一組理論命題的優越性，雖然本書自然有理論架構作為組織的依據。本書主要關切的，並不是理論本身，而毋寧說是後設理論的（meta-theoretical）或方法論上的問題，也就是說，什麼才是適當的理論？

現在，我想我應當指出一些應該是很明顯的事。在本書中，我批判了許多著作，其中有一些，依我個人的看法，是非常貧乏的，有些則是我認為的卓越作品。但批判本身與我相信這本書應有的價值是無關的。我們就是透過批判而學習的，對於本書所批判的許多作者（有許多其他作者是不得已被省略的），我若不承認虧欠他們太多，就顯得心胸狹窄了。

在社會科學此一名號下所進行的許多研究，扮演的是一種接近意識形態的角色。許多情況下，從使用語言的性質即可看出。這類語言都是不必要的掩飾真相以及故作神祕。某些情況下，則是為了偽裝實質內容的貧乏或對某些解釋論點的迷惑，而使用異於常規的語意。在本書中，我已盡量避免使用社會學的術語以及某些社會思想學派自用的語言。雖然我不是做得很好，但我希望我已經說得十分清楚明白，這樣讀者就能輕易地看出我所犯的含糊、錯誤以及混淆。如果說國王真的沒有穿衣服，那就不如公開地承認。當然，我希望情形不是這樣，我希望讀者在本書中即使不能為自己的概念裝備找到一整櫃的衣服，至少也能找到設計與樣式，這樣就可據以從我們所處的這個不斷變遷的世界中，自行剪裁了。

目次

序	i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誕生	1
第二章 歷史能重演嗎？	17
第三章 內部的障礙	35
第四章 世界體系	53
第五章 帝國主義與依賴	69
第六章 社會結構	89
第七章 農村社會結構	117
第八章 政治、國家及軍隊	137
第九章 革命	167
第十章 布爾喬亞階級革命的諸類型	181
參考書目	209
索引	223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誕生

沒有一個社會是永遠靜止而全然不變的，不過，某些變遷仍比其他的變遷顯得更重要。從二十世紀的觀點來看，真正重要的變遷，是西歐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中，所發生的一連串複雜的變遷。造成今日資本主義的一連串事件，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某一時刻，已經開始發生，整個世界的型態受到劇烈的轉變。這些變遷究竟為何？何時發生？何以發生？又如何發生？乃至於這些變遷所造成的社會的性質為何，都是令人爭論不休的問題。

為了要了解這場變遷的性質，並對它有所掌握，遂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逐漸演變成今日的社會學。這些社會思想各有其不同思想路線，對於所發生的變遷，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說法，對於今日社會的描述，也是各異其趣。就中以馬克思 (K. Marx)、韋伯 (M. Weber) 及涂爾幹 (E. Durkheim) 三人的說法最為重要。當然，在他們之前和之後，尚有其他的思想家，不過，他們三位卻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途徑。因此，為了簡單起見，我們的討論將集中在他們三位。

他們三位的研究焦點，都在舊社會與新社會之間的斷

裂、不連續的特性上。在他們看來，近代的工業資本主義是一種性質迥異的新社會。韋伯的貢獻，在於他強調愈來愈廣的生活領域是如何地被納入理性思想控制之下。此一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的過程，意味著權力逐漸由傳統政治領袖的手中，轉移到形式組織——官僚組織——的手上。這種官僚組織所體現的理性，達到了前所未見的程度。理性化的增強與官僚組織權力的提高，二者是攜手並進的。然而這只是此一過程中的一個面向而已。官僚組織中的成員並不能為自己設定目標，他們只能服從命令；因此，在官僚組織的支配之上，必然有某些權威的來源。隨著傳統領袖權威的式微，魅力領袖 (charismatic leaders) 已開始蠶食鯨吞，奪其位而代之。這些魅力領袖崛起於羣衆之間，不受傳統之紐帶、責任的拘束，也不受官僚組織理性規範的節制，他們的行動飄忽難測。然而，在這些狂熱的力量迸發燃盡之後，常規化 (routinisation) 的力量也開始再度抬頭；魅力領袖的繼任者須由選舉誕生，他的跟隨者也將轉變成一個組織，同時，官僚式的常規挾其形式理性又再度居於領導的地位。我們所目睹的現代社會，即是在長期的官僚常規與魅力領袖的非理性暴發之間，來回的擺動——這是一種沒有發展的辯證歷程 (dialectic without development)。

這種增強 理性化過程的趨勢，在整個歷史中不斷的出現，但一次又一次地被傳統型領袖及宗教在文化上的龐大力量所挫敗，並且使其倒退。綜觀歷史，經濟始終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因此經濟行為徹底的理性化根本就不可能，而這

正是轉變生產行爲之組織，以及進入工業資本主義之新時代所必須者。

然而，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時，突然出現了一次突破性的發展。喀爾文及其門人與教會（Church）決裂，反對只有教會可以解釋〔聖經〕這種反理性的傳統主張，並且肯定個人良知的重要性及個人解釋聖經的優先性。喀爾文認為人的命運已由神註定，只有某些人——上帝的選民——可以進入天國，但是沒有人能知道自己是否為上帝的選民。韋伯認為，此一神學理論，在喀爾文教徒心中，引起了強烈的焦慮；這些教徒為了減輕焦慮，並且使自己相信乃是上帝的選民，於是就在行為上，儘量表現得好像他們真的得到了上帝的眷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這意味著對日常生活（包括對經濟財貨的追求）作系統的安排，以避免怠惰及無聊。而其所產生的禁慾主義，以及因焦慮而衍生的一種強烈驅動力，想要迎合上帝之喜好，都導致了快速的經濟進步和資本累積。根據韋伯的看法，此一事實，再加上社會其他範疇漸增的理性化，構成了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催化劑。這樣一個社會，雖然在起源上的性格屬於個人主義，但最後卻因只能給人類自由提供最小的空間，而結束其生命。

韋伯著作所關心的問題，與本書所考察的其他偉大思想家一樣，都是當時正在發展中的道德秩序的性質。他並不只想就所發生的變遷，提出一套中立的說法而已，他還更進一步要探討新秩序為人類自由所開啓的潛力。然而，正如我們前而所述，他的結論十分悲觀。韋伯自己也深知此點，並且

自視為當代的耶利米 (Jeremiah)——一位預言災難即將到來的預言家。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變遷，韋伯的態度，根本就是愛恨交集，而且對過去還懷有一股淡淡的思古之幽情。

這些論題，在與韋伯同時代的法國思想家涂爾幹的著作中，更為顯著。對涂爾幹來說，由傳統社會蛻變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實，乃是前工業社會裏把人們連結成十分緊密之社羣的機械聯結 (mechanic solidarity)，已經瓦解。在過去，人際關係是建立在地緣接近與人頭熟絡的基礎上，但隨著現代社會誕生所帶來的變遷，尤其是都市化，這個基礎已經破壞無遺。這些變遷使得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愈來愈疏遠 (depersonalisation)，而且人們無法再向教會之類的權威性制度，尋求精神方面的指引。此時，原來提供道德標準的來源已經式微，而新的標準尚未能取而代之。現代社會這種沒有靈魂的個人主義 (soulless individualism)，根本不能處理此種廣泛「失序」 (anomie) 的現象。涂爾幹所開的處方，就是建立新的制度，以取代舊有道德權威的來源，並使社會產生有機聯結 (organic solidarity)。他是早期的團合理論者 (corporatist theorists) 之一，期望以工廠內所形成的團合基爾特 (corporatist guilds) 為軸，重新整合人類各個共同體。在新的權威性道德秩序下，「失序」現象已無容身之地。涂爾幹的解決方案，與韋伯的個人主義新教和康德所著重的個人道德，相異其趣，但卻提供了當代社會主要之保守批判的基礎。

馬克思所關心者，亦是工業社會中人們缺少真正共同體 (*true community*) 的問題。在他眼中，此一異化狀態 (*state of alienation*) 源之於社會分裂成數個相互敵對仇視的階級。由於勞工被剝奪了生產工具，變成了工資勞動者，出賣勞動力這種商品，也體驗到與自身及與社會的異化。就馬克思而言，此一異化的根本原因，在於發展出來的新型式的階級社會——資本主義——它的特色就是要把一切事物都轉化成商品。把勞動力作為商品出售，成為勞動組織之主要形式，在歷史上可說是頭一遭。馬克思同涂爾幹一樣，也想克服此一異化狀態，並且創建一種真正人道的共同體，其特色即在於分工的情形將日漸泯滅。雖說如此，涂爾幹想要的，是一種能使個人服從集體的保守、權威團合，而馬克思恰與其背道而馳，想要尋求個人的解放。已經解放的個人，並不接受權威制度的道德指示，而是自由地與其同伴決定行動的方向；換言之，個人是支配社會制度，而不是服從社會制度。個人服從社會制度，對涂爾幹而言，是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答案，但對馬克思而言，仍是人類異化的另一徵候，而人際關係還是被當成物一樣的對待。

馬克思與韋伯二人，都極為重視資本主義的生產潛力。馬克思深信，資本主義內在的成長動力，會產生使其自身毀滅的條件。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法則，就是它累積資本的迫切需要。為了應付長期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資本對工資的比例就需要不斷的提高。此一過程透過一連串商業循環 (*business cycles*) 的進行，短期內，會帶來經濟

及政治的危機；至於長期的趨勢，則是工業建制(establishments)的普遍化、勞工的均質化(homogenisation)與赤貧化。這些情況將會造成勞工與雇主之間不斷的鬥爭，勞工階級也終將了解，他們的唯一出路，就是掌握國家機構，廢除生產工具的私有制，並且開始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以推翻現存的社會。而資本逐漸的集中並流向中央，也助長此一過程。

馬克思的理論受到了許多批評，本書後面，我們將檢視其中某些批評，尤其是關於勞動價值論以及特別涉及低度發展社會者。當然，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以各種方式修正或更改馬克思的理論；這些修正或更改彼此不盡相容。其實，後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和爭議，已經多到了無法明確指出馬克思之真意的地步了。儘管如此，有一件事我們仍須牢記於心，那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主義，是他在十九世紀後半時所目睹的資本主義，因此就算他的命題對當時社會而言是妥當的（某些史學家有所懷疑），資本主義從那時開始也歷經了許多變化。資本主義爾後的轉變，對馬克思的分析所造成的更動程度，常是學者爭論的主題，本書後半部，我們將檢視其中某些爭論。

我們現在所要探討的，是馬克思對現代資本主義起源的解釋。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個階段之中；馬克思則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自十七、八世紀的布爾喬亞階級(bourgeois)革命後，才開始出現。對韋伯而言，資本主義是根據經濟行

為的取向 (orientation) 來界定，其特色是運用純粹的經濟手段，理性地（也即是系統地，可計算地）追求經濟利益。綜觀古今歷史，始終有某些人受到這種資本主義動機的鼓動，但是韋伯也同意馬克思的看法，認為只有隨著現代歐洲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驅力才支配了整個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並不是由資本家的動機或取向來界定的。不論資本家認為自己的動機是什麼，他們都會在經濟體系的邏輯驅迫下，累積資本。在馬克思眼中，資本主義是階級社會的一種形式，其構成是根據特定的方式將人類組織起來，以生產生活的必需品。在歐洲，資本主義之前尚有其他形式的階級社會，在這些社會中，從事直接生產的階級與不從事生產的階級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兩種階級與生產工具的關係，都各不相同。歐洲資本主義之前的制度為封建制度，與工業資本主義比起來，其特色即為直接的剝削。

封建社會中，農民是直接的生產者，他們能直接接觸到土地及在土地上工作時所用的各種工具，他們並不像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工人一樣，與生產工具分離。然而封建社會裏的農人，必須為莊園的領主每週工作數日。這種直接的剝削形式，要靠一種特殊的國家形式來維持，其要素有三：

- 一、一套限制農民流動的法律，使他們被綁在領主的莊園內，並且須依賴領主以求生活。
- 二、非中央集權的軍隊及司法機構，因此，每一領主在其勢力範圍內，擁有最高的權威，並且維持他自己的武力。他對於其上的大領主，乃至於與君王的關係，都是靠封

建的忠誠來維繫，是以整個政治體系的基礎，鬆散而不穩定。

三、一個統一、獨立的教會，為此一結構提供意識型態的辯護（*justification*）以及凝聚力。

當然，封建社會內部有許多衝突和矛盾，但真正說來，我們也未曾見過純粹形式的封建社會。某些歷史學者指出，這些內部的矛盾，最後會導致封建制度的崩潰，而且為資本主義的誕生開路。這種說法牽涉到許多問題，茲述之於後：一、封建制度的崩潰，是由於生產方式的內部矛盾，或者是由外部的因素促成其瓦解？

二、如果封建制度真的是由於內部的矛盾而崩潰，那麼這些矛盾究竟為何？其「主要推動者」（*prime mover*）又為誰？

三、何以封建制度的瓦解會帶來資本主義，而不是其他形式的社會呢？（Hilton et al., 1976）

要確定封建主義何時蛻變到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問題重重的工作。由於封建主義社會似乎在十四世紀時就已經衰落，而我們又很難指出資本主義在十六、七世紀前就已誕生，道伯（M. Dobb）因此認為，在這兩種社會之間，有一個中介時期存在，在這段時期內，小商品的生產方式最為盛行（Dobb, 1963）。

從道地的封建主義社會衰落開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取得最後優勢之日，中間隔著一段漫長的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各項基礎，即在這段時期中逐漸地醞釀成形。這段時

期內出現了資本「初始」(primitive or original) 累積的過程，各式各樣的手段（如掠奪、海外納貢、獨占利益、圈地自擁等），都被用來創造資本主義啓動所必須的資源。在這個時候，主要是由於圈地運動，農人失去了土地，一個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遂因此誕生。到了工業革命之時，技術的進步為資本主義在十八世紀的全面蓬勃發展，提供了物質方面的基礎，此時，制度方面的預備工作早已完成。

當然，除非我們根據勞動過程的性質來界定生產方式，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中間歷史斷層 (historical hiatus) 的觀念，才有意義。與道伯一樣，我們也有一個不曾明言的潛在假定，即封建主義是一種以農奴為基礎的經濟制度，而資本主義則是一種以自由工資勞工 (free wage labour) 為基礎的經濟制度。當然，這只是界定這兩種社會的要素之一，但與其他兩種界定方式形成尖銳的對比。

韋伯式的定義，前面已有討論，依韋伯的觀點，資本主義的定義是一套經濟方面的態度，因此沒有什麼蛻變的問題。在他看來，需要解釋的，並不是資本主義的誕生（因為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各個社會皆可得見），而是資本主義中特屬於「現代」的面向。我們前面說過，韋伯根據理性的擴展 (extension)，對這些面向作了交代。

另外一種界定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可能方式，是分別把它們視為一種自然經濟 (natural economy) 及市場導向的生產。此種界定方式，源之於韋伯以及涂爾幹對社會分工的分析，而在皮耐 (H. Pirenne) 的手上有了精細的發展。